

谁制造了福安标会的噩梦

夏英

在强烈的欲望推动下,福安标会这种民间金融互助组织最终走向异化,成为一场巨额的赌博游戏并演化成社会性的灾难。地下赌场、标会以及参与的老百姓们,究竟谁该为这样的后果负责?

6月24日下午,福建省福安市一民宅内,六七名陷入标会深渊的当地百姓试图向记者描摹标会崩盘的来龙去脉以及随之而来的灾难性后果。过去的一个多月,他们在绝望、悔恨和惊恐中度过。

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标会风暴中,他们被卷入的财富少的有100多万,多的则有600多万,更糟糕的是,这些财富中只有小部分属于他们毕生的积蓄,大部分则来自亲戚朋友、银行抵押贷款、高利贷以及从小会标来的会款。也就是说,除了倾家荡产之外,他们还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债主,其中的一些债主还可能给他们带来致命的伤害。

当地最大的医院闽东医院最近陆续收治了一些特殊病人。安居新村居民苏锦锋因为当会头的妻子欠了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砍了数刀,被送进了医院。另一个受伤的会头郑美荣也住在这里。就在记者到达福安的当天,穆阳镇苏提村会头王希莲因为会脚逼债,割腕自杀未遂被连夜送了进来。

7月3日,福安城内官村的一个会头苏玉影跳河自杀身亡。

在街头巷尾甚至偏远的村镇,可以看到福安市公安局6月1日后发出的通告:禁止采取威胁、恐吓、绑架、雇佣打手等非法手段追讨会款,禁止借机哄抢财物、实施打、砸、抢。

这个以电机和船舶维修业闻名、福建东部经济最为发达的县市之一的福安市,现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标会传统

福安市距离福建省会福州约3个小时车程,依山傍海,是福建东部经济最为发达的市县之一,这里做“会”的传统由来已久。

6月26日,记者到了离福安市区约40分钟车程的穆阳镇苏提村。

村民缪绍麟向记者展示了一张会单。这张会单显示,会头是王希莲,参加会的村民(会脚)有31人,会是“月会”,每个会脚每月要交300元会钱,底座(最低竞标标金,实际上是利息)是30元,开标日期是2002年3月10日。

“会”是这样运作的:会头(发起人)负责召集会脚,在第一个月,每个会脚要向会头交纳600元的会钱,总计是18600元,其中的一半交给会头免费使用,作为对会头筹集会钱、组织竞标、追缴会钱的回报,另一半9300元则拿来竞标。

出的利息最高(假设是60元)的那个会脚,可以拿走这9300元的钱使用,但从下一个月开始,他每个月都必须交纳360元的会钱。这样的竞标每个月都要进行一次,一直到31个会脚都轮遍。

这种标会的好处是显然的:需要应对诸如孩子上学、婚丧嫁娶这样的急用的村民可以通过标会——而不是到处举债——取得一笔现钱,然后在剩余的时间里分期还款;没有标到钱的人则可以赚取他人竞标时出的利息;而会头也可以从中得到免费使用资金的好处。

因此,这种在街坊邻里、亲朋好友之间应急救济之用的“会”就广泛发展起来。会的形式非常灵活,群众手中有个30元、50元都可以做“会”,能凑得齐10个人就可以做10个人的会,参加了这个会还可以参加那个会,完全视个人手上的现金持有量和需要来定。

在苏提,“会”跟老百姓的生活紧密相连。苏提是一个有1000多户人家的大村庄,以手工制作的“线面”而闻名四乡八里。当地村民凌晨两三点钟即起,和制面粉,要一直劳作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能生产出线面来,换取从二三十元到七八十元不等的收入,户平均日收入则在五十元上下。

会头王希莲家并不制作线面,而是收购线面再转卖出去。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地的村民在一天的线面生产出来后,往往直接挑到王家去,卖面的款项也不拿回来,就直接抵作会钱。遇有临时的一百两百的小额需要,他们又到王家以很低的利息借回来。

两年前,村里的农信社代办点撤走后,他们就更多地把钱这样“存”到王希莲那里。王希莲则因此获得更多的周转资金。

由于王希莲信誉良好,“她总是能够当天就把钱送到标到的人那里,七八年来都是这样”,因此到倒会之前,不仅是苏提村,甚至是穆阳镇上的居民乃至苏提周边村庄的人,都跑来做王希莲的会脚。倒会之前,这个只读了几年小学、“文化很浅”的农村妇女,名下的会达到53个之多,涉及金额在七八百万以上。

可以想象,如果资金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封闭运行,没有与赌场发生关系的话,这种发育于乡土、近十年来年利率约在3%、以调剂余缺、互助互济为目的的民间金融组织也许还能继续存在下去。

但事实并非如此。

6月25日晚,左手缠着厚厚绷带的王希莲在病床上不停地喃喃自语:“去年七八月,我就非常担忧了。”

若隐若现的危机和导火索

但即便是忧心忡忡的王希莲,当时也不愿意往“崩盘”这两个字眼上多想。他们固执地认为,它不会演变成现实,更重要的是,它绝对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猴年春节前夕,福安城里的会脚们发现,大大小小的会头突然不约而同打出许多欠条。会脚交了钱进去,中标的人居然从会头那里拿不到钱。这是不祥的预兆。

到了年二十八,大大小小的会头不约而同地宣布停标,过了元宵节再开标。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这更加剧了人们的担忧。

这个时候,据说当地的数家银行行长三次联名上书,要求立即制止这种民间标会。这个消息是否真实,记者没有获得确证,但是中国人民银行福安市支行在2003年12月20日确是向辖下各金融机构发出了一份文件。

这份文件的标题是:“关于谨防民间‘标会’扰乱正常金融秩序切实做好旺季金融工作的通知”。文件同时抄报福安市人民政府。

但是,这个通知并没有起到足够的警醒作用。正月十六,福安城内大大小小的标会又重新开标了,会头们奇迹般地兑付了所有欠条。

“那样的危机(会头兑付不了标款)都过去了,大家又把钱投了进去。”当地的老百姓说,春节之后投入的钱大概能占到全部钱款的70%—80%。

今年三四月间,福安城内几乎是家家餐馆爆满,流行的口号是“争分夺秒赚钱”,许多二十出头的青年女子和三十出头的少妇——她们是标会的主力军,就在餐桌上交流各个会的利率高低,然后就拎着几十万的钱直奔而去。

一个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带着几十万现钞，用 600 块钱包下他的车，一天之内赶了 48 个会。

没有谁愿意停下来想：这正是雪崩的前夜。

5 月 16 日，当地大会头李住突然到公安局投案自首，这个消息一夜之间传遍整个福安城，多米诺骨牌就此倒下，不到一周时间，福安城内的标会全部倒下，不到两周时间，村镇一级的标会也全数停标。

谁为高额利率埋单

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个城市的 65 万人口几乎是集体投入到标会中去，并使得这种以互助为初衷的“会”变成一个套利的工具？

答案非常简单：高额的利率。

目前，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是 1.98%，住房抵押贷款的平均年利率为 5%，当地高利贷的行情是 2 分，即约 24% 的年利率。而把钱投入到标会中所获回报远高于此。

记者获知，在最后数月中，投入 10 万元在一个月内获得的利息在 6000 元到 8000 元之间，折成年利则在 72% 到 96% 之间，这无疑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在高额利率的刺激下，福安当地甚至出现了 10 万元会和百万元会，以常见的 20 天和 30 天周期计，一次标会套取的金额就在两三百万元和两三千万元。

由于村镇的经济发展程度低于城市，因此村镇标会的规模也小于福安市区，利率也低于城市，这就形成了层级，正如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的一样，不论是穆阳镇的会头王希莲还是赛岐镇的会头张银芳都把聚拢来的会钱进一步集中到福安市区更大的会里。甚至福安周边的县市，也出现了资金流向福安的情况。

记者设法找到一个邻近的县霞浦的会头，他表示霞浦的钱也有往福安流的，但是有多少流向了福安，这位会头讳莫如深。

就这样，在高额利率的刺激下，大量的资金从村镇流向城市，从百元会流向千元会，又从千元会流向万元会、十万元会，最终形成了盘根错节、大会套小会的复杂的资金链条。

利率是资金的使用价格，那么究竟是谁出得起这样高的资金价格？

记者在当地的采访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指向了地下赌场。在当地，地下赌场的存在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最为知名的是绰号“弟弟头”的赌场老板。

“弟弟头”经营的赌场是连锁的，这些赌场的赌资巨大，知情人士说，标会崩盘之前，一个赌场光是向赌徒抽取的赌资每天都在 50 万元以上。这里的规矩是赢了的赌场抽 7%，输了抽 6%，仅以 7% 来计算，每天的赌面也在 700 多万。由于金额巨大，计算赌资时甚至不得不直接用尺量，用秤称。

高利贷和“天天会”就在这块每天都需要巨额现钞的土壤里发育起来。

起先，赌场里只放高利贷。但是，赌场里的利息实在是太高，借一万块钱一个月下来要还掉 6000 元，于是赌徒们就在赌场里现场做起“会”来，通过做“会”标来的赌资显然要比借高利贷来得划算，通行的行情是十万元六分到八分利，这个价格比借高利贷来得便宜——付出 6000 元可以获得 10 倍于借高利贷的赌本，又比赌场外的资金价格来得高。

接下来的情形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了。形成于赌场之内的“天天会”模式被拷贝了出来，推动“标会”改变了原来“互助”的性质，成为疯狂套取资金的工具，同时，反过来，“标会”又为赌场输送了更多的资金，促使赌场的赌面加倍膨胀。

现在的局面是卷入标会狂潮的福安老百姓所始料未及的。阳头片区的大会头杨丽芬出走后归

来,给很多人带来希望,但同时也是失望。会脚们获得了初步清偿,但是分摊下来的金额少得可怜,50万元的本金清偿下来只有3000元,不到1%。

因为会头本身的大肆挥霍、会脚透标、携款潜逃等诸多因素,要使本金的返还比率达到公众满意的程度显然非常艰难。

为此,政府专门成立了治理民间标会办公室进行治理。6月1日后,政府还陆续发布了十几个文件,对有关方面的工作予以部署,公安机关则先后两次发出了对14名犯罪嫌疑人的通缉令。

但是,如何彻底治理此事是这个城市面临的严峻考验。事实上,1992年,当地也曾发生过一次倒会事件,那一次“倒会”牵涉的范围很小,主要集中在城市,村镇几乎没有涉及,涉及的金额也很小。

“会”的历史

在我国,“会”这种民间金融互助组织至少在清代中期就已出现,大量存在于民国时期,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消匿了踪影,在1970年代中后期到1980年代中后期又开始出现。主要分布区域是江浙一带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

它是一种在民间资金需求量大的情况下出现的带有金融互助性质的组织,是一种融资工具。它的出现有这样的基本前提:民间社会资本积累比较雄厚,老百姓手中有闲钱,社会的信誉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在做会的人中已经建立了长期互相信任关系。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会”用来生活消费的比较多,在经济发达地区用来再生产比较多,后者具有更大的存续生命力。

历史上发生过的“倒会”并不多见,除非遇到自然灾害、战争爆发,因为“倒会”比较少,“会”或叫“合会”、“抬会”、“标会”一直连绵不绝。

(作者为苏南经济史专家)